



师古与用今的多元思考——以庆历学术与庆历新政为例

(2007-7-3 15:51:01)

作者：卢国龙

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社会变革，虽然历次变革的具体情形各不相同，有时间长短、规模大小、层次深浅、有序与无序状况等等差异，但几乎都要面对同一个问题，即如何立足于现实以展开历史的反思，如何掌握历史传统与时代现实的关系。从先秦诸子围绕法先王与法自然、尊古与重今等等问题的思想分歧，到两汉经学的今古文之争、玄学的名教自然之辩，以及一次又一次的“托古改制”，都可以看作是同一个问题在不同时代的反映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在变革时代出现这个问题是必然的。所谓变革，简言之就是要改变现实或现状，而现实总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不反思历史，对现实的认识就达不到穷本溯源的深度，对变革的前途也就不能作出理性的抉择。所以，致思于历史传统与时代现实的关系问题，是人类试图以理性来铸造自身历史的必然要求，现代如此，古代亦然，我们现在讨论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，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同一个问题的延续。

当然，问题的表现形式有古今之别。古人既未曾遇到今天如此复杂的思想文化局面，也没有“现代化”概念，他们要推进社会的有序变革，通常都采取“托古改制”的方式，其理想目标不是前瞻性的实现“现代化”，而是后顾性的实现“王道”、“古制”、“三代之制”。也正因为“现代化”是前瞻性的，而且在通常语境下是一个科技发展的目标，传统文化对于这个目标又几乎无补，所以传统文化有无价值就成了一个很大疑点。而“王道”是一个人文目标，在古代，像道家的庄子那样怀疑这个目标的价值，是特例，更多学者都立足于时代现实，致思“王道”之内涵，试图通过创造性的阐释，彰显出“王道”之价值。但换个角度来看，问题的表现形式虽有古今之别，而梳理问题的思路却古今相通。“现代化”的前瞻，事实上不能脱离以历史意识为重要内容的思想背景，而且“现代化”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概念，是与传统相对的，所以随着认识的深入，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“现代化”作为科技与人文并行发展的目标，同时也就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人文传统与“现代化”的内在联系。反过来看古人之推行“古制”，其真实目的也并不是要为更古的人重现历史，而是要为未来树立理想目标，作出合理的设计，所以严格说来，他们也只是将人文传统作为一种价值资源，与现代人对待传统的态度并没有本质区别。因为梳理问题的思路古今相通，都必须将传统与现实以及未来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，所以研究古人围绕这个问题的探索，对于我们解决现代问题有启示意义。本文以庆历学术与庆历新政为例，讨论师古与用今问题，只是寻找这种启示意义的一点尝试。

庆历学术和庆历新政的理想目标，是三代之“王道”、“王政”，具体内涵，可以引用其领袖人物范仲淹的话来概括，即所谓“大礼同天地之节”，“大乐同天地之和”，也就是社会秩序与和谐的高度统一。将这个目标作为镜子，现实的种种积弊便都呈现出来。积弊意味着社会已面临变革的必然要求，如果从政治上主动推行改革以顺应这种要求，那么社会变革将是有序的，能够为未来社会的秩序与和谐提供保障。反之，如果政治上因循苟且，僵守痼陋，不主动顺应这种要求，那么将有其他政治势力代之而起，社会变革将是无序的，必然酿成社会大动乱。从庆历一代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各种议论来看，推行政治改革以顺应社会变革的必然要求，是他们的共同主张，他们也因此具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如忧患意识，崇尚变通，振兴儒学以彰显王道、扶救世衰等等。崇尚变通主要以《周易》为依据，彰显王道主要以《春秋》和《周礼》为依据，此即其所谓“学于古”，也即师古。按照古代的王道推行政治改革，即其所谓“施于今”，也即用今。师古而用今，在当时也叫作“明体达用”，明体是推阐人文传统的基本原则，达用则适应时代现实之要求。

政治变革的主张，与忧患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，二者是同时提出来的。其所以忧患，是因为现实政治有种种积弊。如范仲淹《上执政书》说：

惟圣人设卦观象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非知变者，其能久乎？此圣人作《易》之大旨，以授于理天下者也，

岂徒然哉？今朝廷久无忧矣，天下久太平矣，兵久不用矣，士未曾教矣，中外方奢侈矣，百姓反困穷矣。（中略）
悦不思变其道，而但维持岁月，一旦乱阶复作，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，亦今相府负天下之过也。（《范文正公集》卷8）

所谓“穷则变”云云，出《易·系辞》。按照《周易》理论，卦爻的阴阳推移到了尽极之处，便会发生相互转化，所以卦象代表了一个生生不息的循环系统。范仲淹引用这套理论来评议时事，其所谓“穷”，是指因朝廷无忧、天下太平所形成的政治方针。从表面上看，朝廷无忧、天下太平的政治状态似乎很好，然而，由此形成“但维持岁月”的政治方针，却隐伏着严重的危机，其表征，有士未曾教、中外方奢侈、百姓反困穷等等。面对这种危机，必须运用《易》学理论，采取主动变革。这种变革，本质是“变其道”，即改变政治方针。所谓“但维持岁月”即是行黄老无为之政。大致说来，北宋自开国以来所奉行的政策，是采取渐进的方式将军人政权变更为文人政府，以此收拾长期以来形成的藩镇割据之局。为了缓和这一转变过程中的利益冲突，自宋太祖至宋仁宗，都是宽柔为政，虽无黄老之名却有黄老之实，因循惯例，因任社会风气，而纲纪法度的建设则有所未备。其不良后果第一是政府缺少克服自身弊病的有效机制，“三冗三费”之类的积弊，沉痾难返，成为北宋中后期政治的最大难题；第二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，要求中央政府掌握一套相对健全的法规制度，否则不能发挥与集权体制相适应的职能作用，而宋初未建立这样一套制度，所以养成因循偷惰之风，政治上诸事苟且，委靡不振，既不能除弊，更不能兴利。正是针对这种状况，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，发动政治改革，并将改革的方针确定为重振纲纪法度。如他在《十事疏》中说：“我国家革五代之乱，富有四海，垂八十年，纲纪法度，日削月侵，官雍于下，民困于外，疆场不靖，寇盗横炽，不可不更张以救之。然欲正其末必端其本，欲清其流必澄其源，臣敢约前代帝王之道，求今朝祖宗之烈，采其可行者条奏。（中略）庶几法制有立，纲纪再振。”（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143）

《十事疏》是庆历新政的纲领性文件。从这份文件来看，范仲淹显然认为重建纲纪法度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。因为八十年来的积弊乃由于“纲纪法度，日削月侵”所造成，所以从根本上克服积弊的最高纲领，是“法制有立，纲纪再振”，亦即确立大政方针，健全政治的制度化建设。这个改革方针，既是现实的需要，也是儒学的基本精神，所以推行改革与复兴儒学是一致的。范仲淹说：“圣人法度之言存乎《书》，安危之机存乎《易》，得失之鉴存乎《诗》，是非之辩存乎《春秋》，天下之制存乎《礼》，万物之情存乎《乐》。故俊哲之人入乎《六经》，则能服法度之言，察安危之机，陈得失之鉴，析是非之辩，明天下之制，尽万物之情，使斯人之徒辅成王道，复何求哉？至于扣诸子，猎群史，所以观异同，质成败，非求道于斯也。”（《范文正公集》卷9《上时相议制举书》）诸子之书无预于道亦即政治方针，政治方针必须依据圣人《六经》来建立，这表明范仲淹的政治主张与文化立场是一致的，复兴儒学能为政治改革提供强健的文化支持。

但是，《六经》毕竟是古代的政治法典，在时过境迁之后，其法象节度是否完全适用于新的时代现实呢？这就不能不摆脱盲目的恋古情结，展开理性的思考。范仲淹有《明堂赋》说：“揖让而治天下者，明堂之谓也。惜乎，三代以还，智者间间，诸儒靡协，议者喋喋，而皆胶其增损，忘礼乐之大本；泥于广狭，废皇王之大业。使朝廷茫然有逾远之叹，罔然有中辍之议。殊不知五帝非沿乐而兴，三王岂袭礼而至。为明堂之道，不必尚其奥；行明堂之义，不必尽其制。适道者与权，忘象者得意。大乐同天地之和，岂匏竹而已矣；大礼同天地之节，岂豆笾之云尔。”显而易见，范仲淹鄙薄那些拘泥于古代法象节度的腐儒，认为儒家文化之所以未能对政治发挥建设性的作用，原因就在于腐儒们喋喋不休地争论一些毫无意义的法象节度问题，不能因应时代变化而推行其道，从而丧失礼乐的根本精神，使礼乐名教与现实政治相隔绝。要摆脱腐儒的局碍，就必须采取得意忘象的方法，不受古代法象节度的束缚，通过文化变革体现出“大乐同天地之和”、“大礼同天地之节”的根本精神。进而言之，文化变革又不能由学者坐在书斋里按其理想的模式来完成，而必须俯就民意民俗，使之具有最普遍的适应性和合理性。范仲淹说：“逆其民而理者，虽令不从；顺于民而化焉，其德乃普。是以究其所病，察其所宜，礼应时而沿袭，教随俗以彰施，欲求乎广所及也，必在于俯而就之。”范仲淹由此推阐出一种政治理论，“政者为民而设，民者惟政是平”（《范文正公别集》卷3《政在顺民心赋》），意即政治以民众的利益为目的，同时又是民众共同遵守的规则。这两者之间当然存在逻辑关系，从范仲淹的思想来看，他显然是以前一句作为逻辑前提的，所以其思想的更确切表述应该是，政治必须首先以民众利益为目的，然后才能够成为民众共同遵守的规则。这种理论，当然是对儒家民本思想的发挥，又很有些接近现代政治意识的意味，只不过他还没有想到政治可以由民众自设，否则也就跨越了从民本到民主的那一步之遥。

坚决支持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的欧阳修，也同样运用《易》学理论来论证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，并就师古与用今的关系提出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。欧阳修《易》学的一大特色，就是急乎人事之用，扫落各种迂怪浮谈。按照他的理解，《易》之内核是刚柔互用，为最高政治决策建立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依据“《六经》皆载圣人之道，而《易》著圣人之用，吉凶得失、动静进退，《易》之事也。其所以为用者，刚

[\[第 1 页\]](#)

[\[第 2 页\]](#)

[\[第 3 页\]](#)

[\[关闭窗口\]](#)